

张双棣 著

吕氏春秋

词汇研究

(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附《吕氏春秋》用韵及韵读

(修订本)

张双棣 著



商務印書館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张双棣著.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古汉语专书研究书系)

ISBN 978-7-100-05671-7

I. 吕… II. 张… III.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IV. B229.22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3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ǚshìchūnqiū cíhuì yánjiū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附《吕氏春秋》用韵及韵读

(修订本)

张双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71-7

2008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2

定价:30.00 元

目 录

原版代序	何九盈 1
绪论	3
壹 《吕氏春秋》的字和词	15
貳 《吕氏春秋》的基本词	28
叁 《吕氏春秋》的词义	98
肆 《吕氏春秋》的新词新义	135
伍 《吕氏春秋》的同义词	157
陆 《吕氏春秋》的反义词	206
柒 《吕氏春秋》的同源词	240
捌 《吕氏春秋》的复音词	270
玖 《吕氏春秋》词的书写形式	307
附录 《吕氏春秋》用韵及韵读	330
一 《吕氏春秋》韵例	330
二 《吕氏春秋》用韵研究	347
三 《吕氏春秋》韵字表	374
四 《吕氏春秋》韵读	414
原版后记	489
修订本后记	490

原版代序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对古代专书词汇进行全面描写的著作。全书共分九章,20万字。主要内容是对《吕氏春秋》的词汇面貌、词的结构、意义系统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的探讨。本书对先秦词汇研究、对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立论严谨,资料丰富,写作态度也非常认真。据作者自己统计,《吕氏春秋》有单音词2972个,复音词2017个,总共约五千词。可贵的是,作者对这五千词的语音形式、意义系统、语法特点都逐一进行过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具体数据。严格的定量分析使本书的许多结论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者研究《吕氏春秋》词汇,还注意了跟先秦其他著作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如哪些词首见于《吕氏春秋》,哪些词的意义在《吕氏春秋》中发生了变化,哪些意义不见于《吕氏春秋》。这里既有历史追踪考察,又有横向比较研究,对人们了解整个先秦时代的词汇面貌无疑是有意义的。

由于作者对原始材料的研究比较深透,视野又比较开阔,证据很充分,所以书中有不少关于旧注、旧说的驳议,都能言之有据。此书的问世,将成为研究《吕氏春秋》的必读参考书。

作者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作者主持编

2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写了《吕氏春秋词典》，又参加《吕氏春秋》全书的译注工作，这就为词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像《吕氏春秋词汇研究》这样的著作是无法写出来的。我认为，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踏踏实实的学风，尤其是在目前。

何九盈

1989年5月1日

绪 论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研究汉语的历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汉语语音研究,从明代的陈第起,已经注意到“地有南北、时有更革”,知道从历史和方言角度去研究古音;清代学者顾炎武、江永,特别是乾嘉学者如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古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汉语语义研究可以追溯到很早,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出现对某些特殊语词的解释,如《左传·庄公三年》中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战国后期产生汉初完成的《尔雅》,对前代及当时的大量语词分门别类地做了训释,除了对草、木、鸟、兽、虫、鱼等众多名物做了通俗的解释外,特别是对一般语词的解释,已经初步脱离了对单个词义的解释,而是把若干相同的词汇语义放在一起,用一个当时通用的语词去解释。这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同义类聚的研究。汉代出现了好几部关于词汇语义方面的著作,如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这些著作或解释和比较各地区方言语词的意义,或通过字形构造解释语词的本义,或通过名物命名的缘由探寻语源。除此之外,汉唐很多著名学者如郑玄、高诱、孔颖达等对古籍做了很多注疏,他们在注疏中解释了大量的古代语词。这些著作和注疏都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语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正视这笔遗

产,要重视这笔遗产,要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作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语义的宝贵财富。乾嘉学者在词汇语义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不朽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他们利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词汇语义及其之间的联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有意识地完全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研究还远远不够,他们的研究还主要属于微观的研究,把词汇语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还远远不够。^① 因此把汉语词汇语义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它的历史,还有非常繁复的工作要做。

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困难,主要在于汉语词汇非常繁复,历代都有大量新词新义不断产生,而这些新词新义产生于何时,难于确定,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终难避免言其有易,言其无难,更无法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词汇史的体系。从宏观上看,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断代的方法,专书的方法。王力先生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首先要做专书的研究,这是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做断代的研究。周祖谟先生也曾明确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的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为出发点。犹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②了一师、燕孙师的意见非常正

① 江沅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后叙》中说:“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已矣。经史百家字多假借,许书以说解名,不得不专言本义者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经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有所之,罔不就理。”这里讲到了词义的系统性,而且认为分析词义的引申假借是段注的成就,但段注中具体分析词义的系统性还做得不够。

② 见周先生为拙著《吕氏春秋词典》所作序言。

确,为汉语词汇语义的历史研究确定了正确的方法,就是从断代入手,从专书入手,从词汇语义的各个方面,去解释它,去剖析它,写出专书词汇研究,进而写出断代词汇研究。

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开始做《吕氏春秋》词汇语义研究的。我们把《吕氏春秋》作为专书词汇语义研究的首选书,主要是因为:

一、《吕氏春秋》成书年代确定无疑,这在先秦文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涪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这里的秦八年,是吕不韦明确说明的写作《吕氏春秋》的年代,应该说是可信的。对于“秦八年”的解释,历来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首先是汉末的高诱注:“秦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高诱是以在位君主纪年的。清人以历法推算,秦始皇八年是壬戌,而涪滩是指申年,所以不应当是秦始皇即位八年。孙星衍说:“考庄襄王灭周之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吕不韦指谓是年。”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壬子)灭掉东周,名义上的周王朝不复存在,而从此后推八年为己未,不是庚申,所以孙星衍从秦灭东周的第二年算起。王念孙则认为,八字当是六字的讹误,实为秦始皇六年,即庚申岁。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正确,相差也仅在二三年之间。能够如此确切地知道成书年代,对于研究专书词汇语义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很多材料真伪、年代先后的不必要的纷争。

二、《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词汇语义反映了周秦之交的词汇语义面貌。同时,它又是先秦与秦汉的一个过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很多战国末期以前不用而汉代常用的词或词义,都可以在《吕氏春秋》中找到。《说文》:“屣,屣

也。”段玉裁注：“《易》、《诗》、三《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屨，不言履，周末诸子、汉人书乃言履。《诗》《易》凡三履，皆谓践也，然则履本训践，后以为履名，古今语异耳。许以今释古，故云，古之屨即今之履也。”《吕氏春秋》中“履”已有4次用作“屨”的意义，《分职》：“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又比如《诗经·小星》孔颖达疏：“今名曰被，古名曰衾。”先秦“被子”义皆用“衾”，《吕氏春秋》始用“被”，出现2次，《节丧》：“羣马衣被戈剑。”“遗老”一词，《吕氏春秋》首见，为前朝臣民的意义，《简选》：“进殷之遗老。”汉代以后则成为常用词。

三、《吕氏春秋》是用当时的通语写成，很有特色。《吕氏春秋》由吕不韦主持召集门下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书成之后，曾“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这个举动固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也表明，这部《吕氏春秋》是“诸侯游士”以及“市”人都能看得懂的，它所用的语言应该是各国基本行用的通语，词汇语义也是如此。比如《吕氏春秋》“到……去”的意思，主要用“往”，而少用“适”“逝”。《方言》一：“嫁、逝、徂、适，往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吕氏春秋》“逝”用2次，“适”用5次，而“往”用78次之多。可见《吕氏春秋》非常重视通语的运用。又比如《吕氏春秋》“长”义只用“长”不用“脩（脩）”，《方言》一：“脩、骏、融、绎、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脩，海岱大野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脩”是陈楚方言，《淮南子》表示“长”义，只用“脩（脩）”不用“长”，一般认为是避刘安之父刘长的讳，大概也不尽然，这里恐怕也是运用楚方言的缘故。秦晋梁益之间用“寻”，《吕氏春秋》不用，只用“长”，“长”是通语。又比如，《方言》：“逢、逆，

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说文》:“逆,迎也。关东曰逆,关西曰迎。”《吕氏春秋》在“迎接”义上,只用“迎”不用“逆”。用“迎”达 16 次之多,而“逆”一次也没用(“逆”多用于“背逆”义,只 2 次用于“迎击”义)。“迎”是关西方言,而且已经进入通语。《左传》产生于战国初期,“迎”“逆”的运用正好与《吕氏春秋》相反,《左传》中用“逆”多达 130 余次,而“迎”只用 2 次。这一方面说明《左传》产生于关东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迎”在当时还没有进入通语。

从《吕氏春秋》用词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吕氏春秋》虽然成于众人之手,但是一定经过主编人统一过。《吕氏春秋》的执笔人,都是吕不韦的门客,这些门客来自各国,所操语言应该是不尽相同的,但是用词上表现出惊人地一致。如上面所举的例子,“长”义皆用“长”字,无一例用“修(脩)”者;“迎接”义 16 次用“迎”,无一例用“逢”字,“逢”也是关西方言,但无一用例,是很说明问题的。又比如“借用”义,《吕氏春秋》中只用“假”,有 13 次之多,而“借”一次也没有用。“怨恨”义,《吕氏春秋》只用“怨”,有 38 次之多,而“恨”一次也没有用。历来有人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所作,吕不韦只是凭权势挂名而已。我们已有另文从思想上论证《吕氏春秋》体现了吕不韦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吕不韦确实统一过全书。

四、《吕氏春秋》的词汇十分丰富,全书有单音词 2972 个,复音词 2017 个,总共近五千词。单音词中,名词最多,达 1207 个,动词次之,有 1084 个,形容词又次之,有 470 个,其他类词有 211 个。在语言运用和语言表达上,动词居于中心的地位。动词的运用跟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关系极大。《吕氏春秋》动词

非常丰富,光是表示徒手的动作的词就有 42 个,如:把(握)、操(拿着、握着)、捉(握着)、扶(搀扶)、携(手拉着)、抚(抚摸)、搏(抓住)、捥(揪住头髮)、抱(抱着)、拊(轻拍)、扣(拉住)、控(勒住)、掇(攀拉)、曳(向后拽)、推(手向外或前用力使物移动)、指(用手指向)、据(用手撑着)、拔(向外抽)、抽(把细长的东西从里边拽出来)、插(把细或薄的东西扎进去)、搯(插)、投(掷)、扬(把东西撒向空中)、抑(向下按)、摇(用手晃动)、掣(拉、拽)、牵(拉、牵引)、引(拉、牵引)、采(采摘)、结(用手打结)、解(用手解开结)、奉(双手捧着)、拱(两手合围)、揖(拱手行礼)、举(举起)、释(放下)、折(折断)、择(用手挑选)、捫(用手擦)、攘(捋起衣袖)、攫(用手抓取)、搥(用手砸,使之坚固)等。^①《吕氏春秋》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化,有音乐、教育、养生、战争、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丧葬习俗以及农学等等。多方面的文化,必须有多方面的语言词汇来表现,《吕氏春秋》记载古代文化的词汇很多,如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的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营室、东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东井、鬼、柳、七星、张、翼、轸。传世文献中,《吕氏春秋》是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记载了这些名称。^②音乐中的十二律的名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及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相配的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神(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虫(鳞、羽、倮、毛、介)、五音(角、

① 例句均参见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年。

② 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有四象图,其中有二十八宿的名称。

徵、宫、商、羽)、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臭(膻、焦、香、腥、朽)、五脏(脾、肺、心、肝、肾)、五穀(麦、黍、稷、麻、菽)、五畜(鸡、羊、牛、犬、豕)等名称都成套地出现了。复音词占到全部词汇的四成,除大量的专有名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名词,其中有不少新产生的词,如“音乐”“遗老”等等。如此丰富的词汇是我们研究战国末期词汇语义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我们所采用的《吕氏春秋》版本,是以清乾隆五十四年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为底本,参照元、明十四种版本重新校订的本子,这十四种元、明版本如下:

- | | |
|------------------------|----------|
| 1. 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2. 明弘治十一年李翰刻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3. 明嘉靖七年许宗鲁刻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4. 明万历己卯张登云校本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5. 明万历己卯姜璧重刻本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6. 明万历宋邦义等校本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7. 明万历宋启明刻本(仅十二纪)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8. 明万历丙申刘如宽刻本(见《百子全书》)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9. 明万历乙巳汪一鸾刻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10. 明万历庚申凌稚隆套印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11. 明朱梦龙刻本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12. 明黄之采刻本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 13. 明天启吴勉学刻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 14. 明崇祯七年王锡袞刻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校勘工作对语言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必须亲自动手做

校勘工作。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讹误,而讹误是语言研究十分忌讳的。比如《战国策·秦策四》“山东之建国可兼与”,鲍彪本及明代坊间刻本“建”作“战”,今人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依鲍本改“建”为“战”,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也将“建”改为“战”。是否该改,研究过“建国”一词之后就会得出结论。《左传》中已有“建国”连文的,《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但还是动宾词组,不是一个词。《荀子》中则有“建国诸侯”连文者,《王霸》:“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这时的“建国”已经是一个名词性的复音词。《吕氏春秋》中“建国”则已是地地道道的复音词了,《悔过》:“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建国”一词是“诸侯”的意义。《史记》中“建国”一词用例渐多,共出现5次,如《孝文本纪》:“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陈杞世家》:“卒为建国,百世不绝。”《田儼列传》:“齐,古之建国。”《苏秦列传》:“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战国策》中除《秦策四》1例外,《赵策二》:“山东之建国,莫若赵强。”可见《秦策四》的“建国”是正确的,“建”不应改为“战”。又比如《淮南子·原道》有一句话:“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镞,不能与之争先。”高诱注:“策,箠也;镞,末之鍼也。”有的《译注》本将“镞”字注成“马槌末端的刺针”。“镞”字怎么会有“马槌末端刺针”的意义呢?《译注》本是根据高诱的注,是不是高诱注错了?不是,这是一个误字。明代王溥刻本等几个版本不是“镞”字,是“𣪠”字。王念孙说:刘本是。𣪠谓马策末之针,所以刺马者也。《说文》:“箠,羊车马箠也,箠箠其耑,长半分。”字又作𣪠。《玉篇》:“𣪠,针也。”《道应篇》:“白公胜到杖策,𣪠上贯颐。”注云:“策,马槌。端有针,以刺马,谓之𣪠。”《汜论篇》:“是犹无𣪠衔策𣪠而御馿马也。”注云:“𣪠,耑头箠也。”(《说文》:“耑,箠也。”)……𣪠为策

末之箴，故劲策与利鍕连文。今本鍕作锻，则义不可通矣。^①王念孙的意见完全正确。既有版本根据，又有旁证，应该将“锻”校正为“鍕”。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校勘对于语言研究，尤其是词汇语义研究，是何等地重要。

研究专书的词汇语义，应该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以宏观研究为主体。所谓微观研究，是确定每一个词在该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意义，这是专书词汇语义研究中最重要基础工作。确定词的意义，要立足于语言材料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客观地细心地去体会古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不能主观地认为古人表达了什么意思，不能将某一个意义强加给古人。这是最重要的。否则，一系列的错误如望文生义、违背历史观点、忽视语义的社会性原则等都会出现。在客观体会古人所表达的意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充分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汉唐人的注疏，像《吕氏春秋》的高诱注，因为他们去古未远，体会古人的意思更接近古人。清人的研究成果也应该重视，特别是乾嘉的重要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准确地体会和理解语义是很有帮助的。

所谓宏观研究，是对词汇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汇的构成和词的语义系统。词汇的构成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类，可以分为基本词和非基本词，单音词和复音词等等。基本词是语言中最稳固的部分，它们虽然在语言的发展中也有变化，但这种变化一般是其非主要意义的变化，并不影响该种语言的继

^① 参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承关系。非基本词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着，这种变化时快时慢，有新生也有消亡，体现着一种语言在继承基础上的不断发展。词汇系统主要体现在词义的历时关系和词义的共时关系以及词义与词的结合上。词义的历时关系，主要表现为词义的引申系统，一个词由本义通过各种方式引申出不同的引申义，使一个单义词变成为一个多义词，词的多义性是语言词汇发展成熟的标志。确定词的本义及各引申义产生的方式和时代，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确定各引申义产生的时代要靠与前代语言材料作历史的比较，这种比较不应该是泛泛的，而应该是以穷尽性的考察为依据。比如研究《吕氏春秋》的词汇要比较前代的典籍如《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孟子》等，有时为了验证，也要考察大约同时代的典籍如《韩非子》等。为了看出发展，后代的典籍如《淮南子》《史记》《汉书》等有时也需要考察。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新产生的词语的考察。词语的新生与消亡，也是词汇系统历时变化的重要方面。词义的共时关系，主要表现在词义的聚合关系上，即词义的同义聚合和词义的反义聚合。考察词义的聚合关系必须把这些词义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因为聚合群体中的个体也随词义的发展而变化着。这种变化也反映了词汇系统的变化。考察词义的聚合关系，可以了解词义的相同与对立，大同与微殊，找出同义词、反义词的特点。另外，同源词研究也是研究词汇系统的重要内容，它可以通过共时的比较看出历时的演变。

语言中词汇不是孤立的，它与语音、语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词本身就是声音、意义、语法范畴的结合体。王力先生曾经指出：“词是极端复杂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意义、声音和形态结构的整体。我们如果不全面地研究这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就不能发

现一个词的特征。”^①我们研究词汇要始终贯彻这个原则。词的组合关系是一种词义的搭配关系,或者说是词义的语法结合。这种组合关系可以使词义产生变化,或者使词的语法类别产生变化,甚至产生新词。研究词的组合关系是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予以重视。语言与它的书写符号——文字,本来是两个概念,不过记录汉语的汉字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汉字与汉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可以直接体现意义,众多的同音词,有时要靠字形去区别它们的意义。通假现象更是汉字与汉语密切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研究汉语词汇语义不能不注意到汉字。从古代汉语专书语言词汇研究来说,尤其离不开汉字,古代典籍都是靠汉字记录下来的,没有汉字,没有传承至今的汉字,古代汉语的研究恐怕势同登天。

研究专书的词汇语义,材料是封闭的,因此有可能进行穷尽性的定量统计。定量统计是定性分析的基础。穷尽性的定量统计可以避免泛泛而谈,做到言之有据。穷尽性的定量统计要求统计数字必须准确无误,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正确可靠。这种穷尽性的定量统计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而不能是随意的。也就是说,从各类词如单音词、复音词的数量,到每个词每个意义的数量,凡是所论述到的内容都应该有穷尽性的统计数字作为基础。比如我们统计《吕氏春秋》的单音词有 2972 个,复音词有 2017 个,单音词中表现为单义的有 1691 个,多义的有 1281 个,多义词中每个意义各出现多少次,情况如何,都要有穷尽性的统计;复音词也是如此,从单义、多义,到结构方式,都要做穷尽性的统计分析;同义词、反

^① 见《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16页。